

新文学选集第一辑

洪灵菲选集

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
开明出版社出版



新文学选集

洪灵菲选集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灵菲选集/洪灵菲著. —北京:开明出版社,2015.7

(新文学选集.第1辑)

ISBN 978-7-5131-2160-6

I. ①洪… II. ①洪…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6723号

责任编辑:卓玥

书 名:洪灵菲选集

出版人:陈滨滨

著 者:洪灵菲

编辑者: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茅 盾

出 版:开明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青政大厦6层)

印 刷: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8 * 210 1/32

印 张:6

字 数:122千字

版 次:2015年7月第一版

印 次:201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8.00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联系电话:(010)88817647



洪灵菲先生遗像

(一九二九年摄)



一九二九年和家属合影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就成立了“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负责编选“新文学选集”，文化部部长茅盾任编委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文艺理论家杨晦等任编委会委员。“新文学选集”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

这套丛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共12种，即《鲁迅选集》《瞿秋白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和《殷夫选集》。“健在作家”的选集为第二辑，也12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田汉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和《赵树理选集》。

“选集”的编排、装帧、设计、印制都相当考究。健在作家选集的封面由本人题签。已故作家中，“鲁迅选集”四个字选自鲁迅生前自题的“鲁迅自选集”，其他作家的书名均由郭

沫若题写。正文前印有作者照片、手迹、《编辑凡例》和《序》；“已故作家”的“选集”中有的还附有《小传》，《序》也不止一篇。初版本为大32开软精装本，另有乙种本（即普及本）。软精装本扉页和封底衬页居中都印有鲁迅与毛泽东的侧面头像，因为占的版面较大，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刊印鲁迅头像是为了突出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将鲁迅头像与毛泽东头像并列刊印在一起，则寄寓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最终方向，就是走向1942年以后的文艺上的“毛泽东时代”。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已故作家”中，鲁迅、朱自清、许地山、鲁彦、蒋光慈五人“因病致死”；瞿秋白、郁达夫、闻一多、柔石、胡也频、洪灵菲、殷夫七人都是“烈士”，是被反动派杀害的。鲁迅和瞿秋白是“左联”主要领导人；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殷夫都是“左翼作家”。闻一多、朱自清是“民主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但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表现

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①“已故作家”和“烈士作家”选集的出版，“正说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文学和文化所走过来的路，是壮烈的”^②。

“健在作家”中郭沫若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主任，是国家领导人。茅盾“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③又是新中国的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身份特殊。洪深、丁玲、张天翼、田汉、艾青、赵树理等都是党员作家。叶圣陶、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待言，又都是我党亲密的朋友，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茅盾语）的参与者，是“革命文艺家”^④。

“健在作家的作品”，由作家本人编选，或由作家本人委托他人代选。“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由编委会约请专人编选。《郁达夫选集》由丁易编选，《洪灵菲选集》由孟超编选，《殷夫选集》由阿英编选，《柔石选集》由魏金枝编选，《胡也频选集》由丁玲编选，《蒋光慈选集》由黄药眠编选，《闻一多选集》和《朱自清选集》均由李广田编选，《鲁彦选集》由周立波编选，《许地山选集》由杨刚编选。编委会约请的编选者

①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

② 冷火：《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9月20日第4版。

③ 胡耀邦：1981年4月11日在沈雁冰追悼会上的致词。

④ 冷火：《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9月20日第4版。

多为名家，且与作者交谊深厚，对作者的创作及其为人都有深切的了解，能够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准确地阐述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鲁迅选集》和《瞿秋白选集》则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规格更高。

这套丛书的意义首先在于给“新文学”定位。《编辑凡例》中说：“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新文学的历史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文学”的做法，把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意识流小说等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挡在“新文学”的门槛之外了，在今天看来不免“太偏”，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大欢乐的节日”里，似乎是“全社会”的“共识”。《编辑凡例》还说：“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把“现实主义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主流，以此来筛选作品；重塑“新文学”的图景；规范“新文学史”的写作；建构“新文学”的传统；回归“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为新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资源，乃是这套“新文学选集”的意义和使命所在，因而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

遗憾的是这套丛书未能出全。“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

只出了 11 种，《瞿秋白选集》未能出版。瞿秋白曾经是中共的“领袖”，按当时的归定：中央一级领导人的文字要公开发表，必须经中央批准。再加上瞿秋白对“新文学”评价太低，他个别文艺论文中的见解与“左翼”话语相抵牾，出于慎重的考虑，只好延后。健在作家的选集也只出了 11 种，《田汉选集》未能出版。他在 195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田汉剧作选〉后记》中对此做了解释：

当 1950 年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五四作品的时候，我虽也光荣地被指定搞一个选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我想——那样的东西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再加，有些作品的底稿和印本在我流离转徙的生活中都散失了，这一编辑工作无形中就延搁下来了。

“作品的底稿和印本”的“散失”，并不是理由；“惶恐”作品“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这才是“延搁”的主因。出版的这 22 种选集中，《鲁迅选集》分上、中、下三册，《郭沫若选集》分上、下二册，其余 20 位作家都只有一册，规格和分量上的区别彰显了鲁迅和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

将，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主将”和“向导”^①，从而为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定下规则。

鉴于这套丛书的重要意义，本社依开明版重印，并保留原有的风格，以飨读者。

开明出版社

^①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7日第1版。

编辑凡例

一、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如果作一个历史的分析，可以说，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现实主义（也曾被称为旧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也曾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这两大类。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从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便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

二、现在这套丛书就打算依据这一历史的发展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以便青年读者得以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新文学发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识。本来这样的选集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作品时代先后，成一总集，又是个别作家各自成一选集；这两个方式互有短长，现在所采取的，是后一方式。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须要加以说明。第一，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换言之，亦即企图藉本丛书之助而使读者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

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因此，我们的选辑的对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们。这一个范围，当然不是绝对的，然而大体上是有这么一个范围，并且也在这一点上，和《人民文艺丛书》作了分工。第二，适合于上述范围的作家与作品，当然也不止于本丛书现在的第一、二两辑所包罗的，我们的企图是，继此以后，陆续再出第三、四……等辑，而使本丛书的代表性更近于全面。

三、本丛书第一、二两辑共包罗作家二十四人，各集有为作家本人自选的，也有本丛书编委会约请专人代选的，如已故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有序文。二十馀年来，文艺界的烈士也不止于本丛书所包罗的那几位，但遗文搜集，常苦不全，所以现在就先选辑了这几位，将来再当增补。

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

我所知道的灵菲

孟 超

我认识灵菲是在一九二七年冬天，那时正是大革命退潮之后，革命势力退出武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了南昌暴动，部队进入潮汕，发动了广州暴动，党的活动便转向地下，反革命的刽子手们虽然到处加紧进行着残酷的白色恐怖，但许多革命工作者对于他们的回答，却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和继续搏斗的事实。而我们这一群，抱着同样的心情，从不同的战场上，从不同的省份里，冒着追捕、杀害的种种危险，聚集到了上海。在新的革命工作的要求之下，寻取了另一种斗争方式，用笔的武器，开始建立了阶级文学的新的阵地。当时，光赤、阿英和我，把曾经在武汉酝酿过的文艺团体，正式组织成了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灵菲、平万，还有杜老国庠（那时他化名林伯修），组织了我们社，出版了《我们》月刊。这两个团体，这两个刊物，虽然对外是各自独立着，其实在同一目标之下，不但步调一致，慢慢的两个组织也由二化

一了。

我还记得和他最初的见面，是在北四川路底横浜桥口一家极小的广东馆子里，我和阿英在那里吃最廉价的包饭，他和平万、杜老也常常在另一个桌上出现。这个饭馆客人并不太多，每次相遇，从神态中，从谈话的口风中，彼此是早已默识了，但开始接谈，还是经过了郁达夫的介绍。他把大家拉拢到一个桌上，几杯白酒，一场热烈的叙话，从此就恍如多年的旧交。不过，灵菲平常总是谨愿沉默，不多发言，虽然也有感情激越的时候，只不过高笑几声，一刹又恢复到宁静，特别是对于他过往的事迹，更是很少叙述。现在时间相隔已经二十几年了，每次回想旧事，虽然他那瘦削清癯的身影，他那诚挚热情的神态，往往就自然涌上眼前；而关于他的出身经历，以及怎样的走上革命的道路，总觉得知道的实在不够详细，难以整理出个头绪。

据我仅能忆及的：他是广东潮州人，曾经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这个学校便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当他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正是南中国革命潮流高涨的期间。他在中国共产党最初运用统一战线政策而获得成功的国共合作政治局面下，开始参加了学生运动，参加了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的组织，更由此接近了马列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在沙基惨案反帝斗争中，做过不少的组织与宣传的工作；他也曾亲眼看见过中山舰事变的发生，看见过北伐，以至于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和屠杀革命力量。萧楚女、张太雷以及许多死难烈士的斑斑的血迹，更培养了他，教育了他，使他愈加坚强起来。由于事变之前他

曾工作在广东政府海外部，兼作着党的支部工作，早已被反动派所嫉视；事变以后，就被通缉，几次受追捕搜查，有一次躲到尼站庵的棺材房里才幸免于难。这样，他成了奔波流亡的逋逃者，流浪到新嘉坡，流浪到暹罗。虽然无时无地忘记过革命事业，但无处可以容身。最后，乃决然到了上海，我们的相识正是在他流亡之后。

我还记得在一个寒风峭厉霜雪逼人的晚上，在他住的亭子间里，我们两个人瑟缩地坐在没有热气的火钵旁边。严酷的时令正象征着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他却忽然的把平时冷静沉郁的心的慢幕揭开，露出了内蓄着的狂烧着的热情，高声朗诵李白的诗，杜甫的诗，拜伦、雪莱的诗，用长歌狂啸抒发尽了久压的淤积。自然，曾经度过二七年代的革命潮浪的人，谁也会知道那时革命青年中是有不少的人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生活，一面是严肃的工作，坚韧的精神；另一面就是浪漫谛克的气质和行动。当然，这还是由于革命知识分子的阶级性的限制。但这表现在灵菲身上，却显得极不调和，因为他的诚朴谨愿使人难于想象到他的豪放疏狂。这样，使我不能不笑着向他说：“你具有纯厚的，不加雕琢的农民的性格，同时也具有放浪形骸的诗人士大夫的性格。”他听了我这话，沉了一沉，收敛了那激发的感情，慢慢的告诉了我他的身世。

他出身在一个贫苦破落的家庭中。他的父亲是落第秀才，最初靠了课蒙为生，后来转业中医。他从小就长养在农村里边，得到了土地的培育，也沾染了土地的气息。家庭中父母，弟兄，姊妹七八口之多，主要的依赖了他父亲不足五十元的收

入，来维持全年的生计。他告诉我说：从出世长到十五岁，还没有尝到鸡蛋是甚么滋味。他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家庭的劳动工作。每天，天还不亮，鸡刚叫过，就同姊姊弟弟拿着吊箕、铁钯，到村巷里，捡拾猪粪、蔗渣；猪粪捡来做肥料，蔗渣捡来当柴烧。在农村里，穷苦人家的孩子们都做这些劳动，然而却被富人家孩子瞧不起，对他掩鼻而过，加以鄙视的白眼，甚至于迎面向他额角上吐上两口唾沫。这样，贫与富的阶级间的不平的思想，在他幼小的年代早已插下根，种下了仇恨的苗。自然在当时他只能背地里偷哭，向着爸爸妈妈申诉，而能够得到的安慰，也仅仅是：“孩子，等你长大成人，有了出息就好了。”这是妈妈的话。至于严肃的父亲，就连这点都没有，除了要求他“上进”之外，只有对他的苛责了。

他缕缕的叙述着这些童年的琐事，窗外呼呼的北风，似给他做着忧郁的伴奏；然而，他的话却又从低沉转到了激昂：“‘有出息’、‘上进’，全是空话，现在我早已明白了这些社会制度造成的罪恶，只有用革命来解决的。”这些故事给我以启示，使我更进一步知道他与革命的结合，固然由于时代所造成，而他的家庭，他的出身，几乎使他具备了先天的革命的条件。

在那时，灵菲惯说的一句话是：“革命运动虽然受到暂时的挫折；但我们有一枝笔，就会使他从另一方面蓬勃起来的！”是的，当时革命文学运动的确是有了极大的开展。从事这一运动的，由各地汇集到了上海，得到党的指导，特别是秋白同志，更是重视这一工作。在我们这一小部分中，又推他是最勤